

古籍珍影



第一輯



第二輯

古籍論叢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五年·福州

古籍论丛

第二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625印张 2插页 304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15

书号：11173·118 定价：2.60元

目 录

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	张舜徽(1)
郭沫若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王义耀(10)
《商颂》述作考·····	金德建(25)
试论《战国策》之为书·····	李叔毅(33)
《鬼谷子》注本点校序言·····	王燕玉 张庚桃(46)
《史记》非官书论·····	华钟彦(59)
关于《史记》原名问题·····	王重九(66)
从《史记》看司马迁与诸家之关系·····	肖 黎(73)
《史记·陈涉世家》诂正·····	王德元(94)
《晋书·宣纪》的几个问题·····	吴钰钰(112)
《宋史·职官志》辨误·····	顾吉辰(129)
《宋会要》辑稿的流传和整理·····	王云海(148)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来可泓(165)
《读通鉴论》述评·····	仓修良 魏得良(181)
简论标点本《二十四史》等古籍中科学家传 的误断与错讹·····	管成学 王兴吉(219)
“洞庭五渚江南”考辨·····	卞鸿翔(236)
古书释误举例及探原·····	贺卓君(251)
《古书疑义举例》商兑·····	朱榴明(262)
古代铭刻文字与古籍校勘·····	赵 超(272)
钱大昕以金石文裨史学(读《金石文跋尾》)·····	施 丁(290)

句读考.....管敏义(306)

李益祖籍及出生地考.....王亦军(319)

《台湾外记》作者辨正.....陈支平(332)

题旧抄本《淪性堂不系舟诗草·蜉吟草》.....涂宗涛(336)

书《潜研堂文集》后(史源学实习札记).....吕友仁(341)

《赣州府志》、《兴国县志》中的四篇唐代制书.....卞孝萱(349)

《辽东志》修纂考.....王晓岩(354)

《闽书》国内存本小识.....侯真平(360)

《大德南海志》研究(元代初年广州港的进口商品).....陈连庆(370)

《红雨楼序跋》前言.....沈文俤(401)

补

白

赞“一笔不苟”(93)介绍孙奕《履斋示儿编》(271)特殊的读音(250)
司马光爱护书籍(261)欧阳修作文认真(331)矫诏、檄书、露布、蜡弹
(赵升·318)旦表、谢表、贺表、起居表(赵升·331)孙子删诗(梁绍壬·
340)吴兢《贞观政要》(王鸣盛·348)《史记》有后人窜入处(赵翼·
271)史汉书法(洪迈·353)契丹之转音(文廷式·250)古书托名(何
蘧·65)敕牒(赵升·235)诏书、制书、手诏、御札(赵升·305)诗二
首(缪钺·32)读杜少陵集(吴三立·58)读辛弃疾词(沈轶刘·218)
读苏曼殊集书后(史莫元·218)读杜诗(富寿荪·58)

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

张 舜 徽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整理古籍的呼声，已经是高唱入云了。但是，整理古籍，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有的。假若没有历代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出色的成绩，我们今天便毫无凭藉能够接收文化遗产、阅读往古的典册。所以几千年间的传注家、文献学家们集中精力在这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一切条件，都超过了前人若干倍，自然可以而且应该做出超过前人的成绩。这便需要对这一工作有个通盘打算和长久规划。由于我一生钻研文史，长期和古籍打交道，愚夫千虑，或有一得。现在将我所见到的有关整理古籍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如下：

第一 指导思想

今天正是我国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

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新民主主义论》）又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论联合政府》）我们今天接收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古籍，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据说，中华书局的统计有八万多种古籍，而北大图书馆反映，约有十二万种。无论八万种也好，十二万种也好，不等于每一种都是“国宝”，都要加以整理。其中有真的，有假的；有好的，有坏的；甚至还 有些是有毒的。我们能够不加区别、盲目地进行整理吗？所以必须牢牢掌握毛泽东思想做我们工作中的指导思想。

第二 整理古籍的准备工作

1. 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我国远古的遗文旧事，初但口耳相传，著之竹帛本晚。一部分书，出于周末；一部分书，成于汉初。遗文旧事，经过后人补写成篇，不免有夸大，有虚构，离开实际情况很远，这便出现了文献资料的可靠性问题。所以孟轲在战国时，已叹“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篇》）。后来托古作伪的书，一天天多，经过汉代学者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逐一指出了伪托之迹。今天保存在《汉书艺文志》班氏自注中的辨伪之言还不少。在著述界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伪书，学者们便需要有辨伪的眼光和学知，才不致为伪书所骗。自从汉代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发凡起例的工作以后，历代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连唐代文豪韩愈，在自述学文的艰苦过程也说：

“……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答李翊书》）很明显地将古书分成了三类：一类是真（正）的；一类是假（伪）的；一类是书虽真而价值不太高（不至）的。可知韩氏平日读书，也认真进行了辨伪工作。经过宋、明、清及近代学者的进一步探研，取得的成绩更大。今天我们，必须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作出的精辟结论，对充栋积字的故纸堆，来一次大的清查，是有必要的。百年以前，张之洞在《轩轩语》中说过：“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的确，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古书，不免望洋兴叹。如果掌握了辨伪的识力，便自能鉴别书的价值，有所别择去取，不致空耗岁月，多走弯路，这对节省时间来说，也有极大好处。所以去伪存真，是整理古籍的先决条件之一。其次，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又须来一次去粗取精的甄审。把那些常见的必读的书，摆在整理的前列；把那些偏僻的比较粗糙的书，放在后面。这样，才能使轻重有别，处理适宜。不致于盲目地进行整理，自乱步骤。其实，有些书随时世迁移，早已失去了它的效用，如《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之类，在今天没有阅览的价值，自可存而不论，不必再整理它。这样的古书，保存在大小书库内，还是很多的，我们必须进行甄审。

2. 校勘之后，写定群书

一般校勘古籍，都只注意在字句异同以及讹、变、衍、脱之迹，这只能说是校书的起码工作。更重要的，在能将文献资料的来源、真伪和写作时代，都能通过校勘弄清楚，再从而进行重新写定的工作。清代学者龚自珍，便曾有写定群经的志愿，这工作是需要人去作的。例如今日通行本的《尚书》五十八篇（《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十三经注疏》内的《尚书》皆是），其中大部分是后人伪造的。经过宋代学者吴棫、朱熹首先怀疑，到

清初阎若璩进一步深入研究，举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将晚出古文尚书作伪之迹一一揭发，早已成为定案。所以后来解说《尚书》的，便只围绕那比较可信的二十八篇作注释。清末吴汝纶更取《史记》诸书校订二十八篇，注明同异，写成《尚书定本》。这一方法，自可推广到其他书籍。

谈到整理《二十四史》，也是这样。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这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史记·司马相如传》末称引扬雄评论词赋的话，《屈贾列传》末叙及贾嘉在汉昭帝时列为九卿的事，都是后世钞书的人附加上去的。《汉书·李广利传》有错简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八字；《后汉书·郭泰传》有七十四字本为《注》中引谢承《后汉书》语，后乃窜入正文；这些，都早已经过去学者一一指出，精确无疑。我们今天仍让这一类的错乱现象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行吗？《史记》、两《汉书》是人们常翻的书，尚且如此（例子很多，兹特各举其一）。推之其他史籍，情况也是很严重的。至于久经传写，造成文字的缺、夺、讹、衍以致前后文气不相融贯之处，尤不可胜数。我们应该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探索所得，对《二十四史》正文来一次写定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也自然不能例外。有了一套写定的本子以后，再从而进行注释和翻译，读者受益，自然是大得多了。

3. 重新区分古籍的门类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很长时期内，是用经、史、子、集四部来区分古籍门类的，至今沿而不改。究竟四部之中，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书是次要的，哪些书是无用的，没有人分析清楚，又何以从辨别其高下浅深，对于整理古书来说，是一个大难题。为今之

计，应该从每一写作的内容实质来区分古籍门类。古籍的大部分。从内容实质来看，大要可分为“著作”、“编述”、“钞纂”三大类。由于作者所投下的劳动不同，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就不同。所谓“著作”在古代要求很高，是专就创造性的写作说的。无论它的内容，是抒情、是纪实、还是说理，由于它们同有一条件，便是这些内容，都是前人没有说过或记载的，第一次在这部书内出现，这才算是“著作”。所谓“编述”，是在许多可以凭藉的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制作的功夫，用新的义例，改编为另一种形式的书籍出现。尽管那里面的内容，不是作者创造而是从别的书内取来的，但是经过了细密的剪裁、熔铸，把旧材料变成更适用的东西，这便是“编述”。至于“钞纂”，乃是由其他很多书籍中辑录而成。一部《十三经》，如《周易》、《论语》、《孟子》，是“著作”；《尚书》、《春秋》，便是编述；《尔雅》便是钞纂（辑录汉初众家传注而成）。这样一分，书的内容实质和它的功用便明白了。对浩如烟海的古籍，能从内容实质区分高下浅深，知道哪些书是应该精读的，哪些书是可以略读的，哪些书是仅供翻检的，便直接提高了学者们的识力，对整理古籍，必然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

4. 甄别汇刻诸书的功用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刻书，每喜汇刻多种古籍成为一书，用数目字标立大名。所谓《十三经》、《廿四史》、《九通》之类皆是。究竟这些汇刻诸书中，每部书的功用如何？是很少有人过问的。例如《十三经》中的《仪礼》十七篇，是记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冠、昏、丧、祭、朝、聘、射、乡诸礼仪，无非是一些宾主跪拜、揖让进退等极其烦琐的繁文缛礼。由于文辞古简，过去学者便苦其难读，读者亦不能尽通。到今天，自然不必

要求一般人去阅读它。保存此书，固可从其中考见古代亲族关系、宗教思想、以及统治阶级一切生活方面的享受情况；但这究竟是少数考古学家的事，而不必要求其他知识分子都熟悉它。所以它虽列在《十三经》内，而整理、翻译之功可缓。反之，有些书虽不在《十三经》中，其价值却很大。例如《大戴礼记》的内容，较之《小戴礼记》（即今《十三经》中的《礼记》）却好得多。我们不能因它没有收入《十三经》而蔑视它；相反地要好好地整理它。早在清代乾嘉学者中，段玉裁便创立“二十一经”之说，认为要读的重要书籍，本不限于十三部。必须打破《十三经》的旧范围，开拓研读古籍的新领域，这见解在当时是很卓越的。我们今天，更没有理由只围着《十三经》兜圈子了。

所谓“十三经”，是在“五经”、“九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二十四史”，是在“十七史”、“二十一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时代愈后，包括的书愈多，何尝有一定数字！我们今天整理古籍，必须取消这一类的大名，仔细从书本的内容实质方面审定书的价值和作用。不能拘守成见，首先肯定凡是收入了《十三经》、《二十四史》的书都是价值很高、功用很大的书。例如公元1343年3月至1345年10月，不到三年的时间，元代便完成了《宋史》、《辽史》、《金史》的纂修工作，共计七百几十卷。由于草率从事，以致脱落疏漏、重复叠见的地方至多；互相矛盾、彼此牴牾之处，所在皆是。其中《宋史》496卷，尤为芜杂。元末、明、清学者，都想改修它，由于卷帙浩繁，不易动手，也都没有成功。我们今天整理这部书，是承讹袭谬、原封不动地照旧本字句作注释翻译呢？还是首先去其重复、订其讹谬、写成定本之后，再进行注释翻译呢？当然，后者是必由之路，只是花的时间要更多了。

至于所谓“九通”，是在所谓“三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本来，郑樵的《通志》。是通史体例，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专讲典章制度的书，体例完全不同。封建统治者只看到这三部书同以一个“通”字标题，便合刻在一起，名为“三通”，已经极不合理。清代乾隆年间，一再续修，成为“九通”。如果论其功用，杜佑《通典》，只分八门，已嫌疏略；马端临分析为二十四门，并补充内容方面的缺遗，较《通典》详备多了。今天我们实事求是，从寻找史料的功用出发，《文献通考》和它的几部续编，倒是我们考证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源。我们可以先从《文献通考》正续编整理起，其余可缓。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整理古籍，必须从每部书的内容实质去加甄审，而不可为那些所谓“十三经”、“廿四史”、“九通”等大而无当的标题所吓倒。功用较大的书，可先着手整理，有些要从汇刻本中抽出来使之单行，不必仍旧捆在一起，使人望洋兴叹。这对发挥古籍的作用，提高读者的勇气，是会有好处的。

第三 整理古籍的两种方式

1. 机械地从每部书下手，加以校勘、注译和翻译， 成为人人易懂的读物

过去传注家的解经，便是走的这条路，而以汉、宋学者所做工作为最多，并且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汉代传注极盛，以郑玄集其成；宋代传注纷起，以朱熹集其成。他们都从校勘入手，然后解释字句，发挥意旨，使古籍渐渐可读。复有“集解”、“集注”、“义疏”、“正义”之类，相继出现，给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此外如唐初颜师古的注《汉书》，李善的注《文选》，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至于刘宋时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后魏时酈道元所注《水经》，又不专以注释字句为事，大量地搜集了遗文旧事，以补充原书的简略、缺漏，使读者能够了解更多的事物，

贡献也是很大的。我们今天可以凭借的清代诸儒及近世学者的研究成果，至为繁富；这种优越条件，远远超过了古人。我们在整理古籍方面，应该做出胜过古人的成绩。除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对书本进行校订、注释之外，还要用现代语言文字，译成人人易懂的读物，这是我们的责任。

2. 灵活地综合古代文献资料，加以剪裁、熔铸， 用当代语言文字编出人人能看的新书

这是两千年前伟大学者司马迁所走过的路。他凭借了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认真地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加以融会贯通、剪裁熔铸的工夫，将有用的古籍，用汉代语言文字写出来，收入他的巨著——《史记》中。夏、商、周《本纪》成，而《尚书》在其中；春秋列国《世家》成，而《春秋左传》在其中；《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成，而《论语》在其中。都用当时通行的字义，换代了古代的难字、奥义，使读者易于索解。读了他的这部书，无异于读了若干部古籍。这种整理古籍的方式，替人们节省了精力，带来了方便，使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古文献，熔化为一体，编成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宝库。对保存和传递文化遗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北宋司马光，根据历代旧史，删繁就简，上起战国，下终五代，用北宋语言文字，编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成为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资治通鉴》，也自然是整理古籍的硕果。这样的事实，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还很不少。我们今天，又何尝不可以组织人力，综括古代群书，撷取精华，各系事类，用现代语言文字，编成一部内容丰富的新书。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很想创新体例，写出包罗较广的《中华人民通史》，自然也是从整理古籍的角度出发，变通义例，初步拟定的一个计划，已经列为几年内整理古籍的重大项目。

第四 整理古籍的组织机构

大规模地组织人力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毕竟是一件要下最大决心作长久打算的工作，想把它做好，一定要有个长远的布局 and 机构的设置。

这件大事，不是召开几次会议所能解决问题的。首先，要由国家设立古籍整理馆，组织一部分人集中到馆内进行专职的工作。有些古籍是要重新编次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有些古籍是要详加译注才能使人明白易晓，二者并行不悖，人力、日力、财力集中使用，收效必然很大。当然，也不排斥馆外专家们的独自工作，但是不可完全把任务摊派到各高等院校去，因为学校别有任务，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未必对整理古籍都感兴趣，即使由组织安排去作，做起来也不安心，效果也就不很好。关于这一点，有慎重考虑的必要。

其次，要筹设古籍整理出版社，专供出版整理成果之用。目前虽有北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单位可以承印古籍，但是他们的涉及面广，任务繁重，不可能专为古籍整理服务。就今天我国出版界的设备和条件来看，一部书的出版，因排队积压，可以到多少年。缓不济急，不能及时反映整理古籍的成果。所以在这一事业上，有筹设专门出版社的必要。

郭沫若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王 义 耀

(一)

郭沫若同志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在他一生十分丰富和造诣极深的学术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等领域内的卓越建树，几乎无一不是在大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作出的；就是象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果，不少也跟古籍的整理研究有关。对于郭沫若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李一氓同志在《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中曾经指明：“……郭沫若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时代区划上，应该是了不起的前驱者，在古文字学上，有独到的贡献。……他是学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非常明显，他对于恩格斯就有特别精湛的学习深度。从他不少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试以郭老的史学研究工作为例，看一看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充分发挥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作用，写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使他成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

郭沫若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称为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这部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正是郭沫若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一

项重要成果。郭老当时写这本书，是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以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并具体阐述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推移的过程，从而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确实是与马恩论证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相一致。然而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证实这一结论呢？怎样来完成这部科学著作的写作任务呢？郭老就是通过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来完成的，而且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之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我们可以在郭老自己于1936年所写直到1982年才发表的一篇《我与考古学》一文中，详尽地看到这段过程：

记起来是1928年的事了。我第二次跑来日本，手里是一本古籍也没有的。开首耽读了一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在七八月之交，忽尔想到幼小时读得烂熟的《周易》里面，很有丰富的辩证式的意味，便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的《易经》，是薄薄的两册，除了附有日本式的训点及卷头偶尔标注的反切和字义之外，完全是白文。但那书有点好处，是把经与传分开了的，读起来比一般经传合刊的本子来得便利。我就根据这个本子，费了八天功夫，草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的那篇文章。有趣的是文章刚草成，便被东京的敬言先生请我去和我客气了一下。那时倒作过一番也还幽默的想念，便是‘文王拘而演《周易》’，反过来却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被敬言先生款待了三天，回寓之后又继续著作《诗经》和《书经》的研究，但也同样的可怜而且胆大，所凭借的本子也只是花了几毛钱在东京买的朱注本和蔡传本，一口气又写成了那篇题也长文也长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在精神生产上的反映》。这里，郭老虽然没有仔细交代他是怎样整理《诗》、《书》、《易》这几部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先秦古籍的，但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籍的研究有很深的功底，经过了多年的潜心研究，并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能在东渡日本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远远超越前人的划时代成就，而且这一整理研究的

过程也没有到此为止，郭老在上文中接着写道：

然而在此文一做好之后，自己便有点踌躇起来了。《诗》、《书》、《易》这三部分尽管是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书，但那是在世上传了几千年的，有无数的先人之见渗杂在那儿，简编既难免偶有夺乱，文字也经过好些次的翻写，尤其有问题的，是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标准。因此我从那三部书里面所建筑出来的古代观，便不免有点仅是蜃气楼的危险。因此我也就切实地感觉着有研究考古学以及和考古学类似的那类学识的必要。我的对于甲骨文字和殷周金文的研究，便从这儿开始了起来。

后边郭老还讲了一大段他在日本同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钻研甲骨金文的过程，并取得了同样辉煌的成果，他针对那些封建的买办的假学者、假古董，豪迈地宣称：“就那样，仅仅费了四五十天的工夫，把所有关于古器物古文字之类的著作便完全读破了。在未读之前觉得有点可怕，被一些大人先生们说得神乎其神的东西，在一着手读之后，其实也只有那么一回事。”

郭老当年攻下的这两大堡垒：儒家经典和甲骨金文，便是他整理研究古籍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也是他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重要著作的两大支柱；他就是这样把古籍整理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历史研究工作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而且也使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二)

郭沫若在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方面，他在亲自参加大量实践工作的基础上，也曾作过许多有益的理论探讨，至今对我们仍然很有教益。

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曾针对国粹主义的复古派和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谬论，明确指出：整理国学，是有一定研究价值的，但